

百年新史

辛亥革命

史话

◎马敏 彭南生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辛亥革命

史话

◎马敏 彭南生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辛亥革命史话 / 马敏, 彭南生主编. — 广州 :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5

ISBN 978-7-5100-3473-2

I. ①辛… II. ①马… ②彭… III. ①辛亥革命—通俗读物
IV. ①K25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352 号

辛亥革命史话

责任编辑 陈 洁 卢家彬

封面设计 余坤泽

出版发行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34203432

印 刷 武汉三新大洋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3473-2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开端

（代序言）

马敏 彭南生

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纪元。

民族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地域内的、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经济、文化结构中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形成民族共同体。同一共同体内的人们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利益一致性，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上，费孝通曾经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重要观点，既强调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又尊重一体化进程中的多元现状。在一体化进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对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意义在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无高下贵贱之分，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民主共和，从此，构成中华民族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利益相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这个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起点。

此前，中华民族处在自在时期，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古代族群间的相互征讨、扩张、交往、互动，推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同化，奠定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疆域。有学者将汉族的形成模式概括为“滚雪球式”（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也有学者将中华民族的形成模式抽象为“搅拌式”（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方式虽有异，但中华民族的融合、涵化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大体上看，清朝最终完成了汉、唐、元、明以来的民族融合事业，今天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在清代即已最终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

体。”(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第8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不过,在这个共同体内部,还存在着民族优劣论,各民族间的地位也不平等,共同体的维系有时伴随着统治民族对被统治民族的征服、压迫,因此,民族间存在着隔阂、误解,甚至威胁着“王朝天下”的存在。

无庸讳言,清前期的民族政策具有歧视性,剃发、易服、圈地、投奔、逃人等政策曾给汉民族造成了伤害,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清朝中后期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满族日益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进入近代,这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着空前的挑战。鸦片战争及其接踵而来的列强对华侵略战争使中华帝国遭遇坚船利炮的无情打击,不平等条约制度使中国社会遭受欧风美雨的浸洗。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边疆危机到十九世纪末的瓜分狂潮,民族生存的共同家园遭受蹂躏。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断加深,国土被割,国权不伸,国耻日增,民族受辱,共同的命运将国内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此伏彼起。在共同体内部,从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内部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受到质疑。不可讳言,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上,部分激进的革命派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倾向,甚至将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但是,同样不应忽视,即便是在“排满”、“反满”的激烈革命话语下,也不乏对民族关系的理性反思。主张君主立宪制的梁启超等维新派便倡导大民族主义,“吾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侯以对于国外之诸侯也。”(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卷五,第10页,中华书局1989年)在大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梁启超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能够涵盖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大民族概念。即使是主张革命甚烈的留学生也认为革命并不是排除满族,而是反对清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建立各民族平等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大目的,在统一全族以立国。”(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3期),这里的所谓“全族”当然包括汉族之外的各少数民族:

吾人之所谓民族主义者,岂对于一切之异种而悉排之哉?民族主义有狭义有广义,狭隘之民族主义,必不适于今日之世界;以广义言,则世界上无论何种族,必得平等之权利,不平等则不能争者也。……吾人所主张之民族主义,亦至于恢复自由而止,若夫满洲政府既倒之后,凡汉、满、

蒙、苗诸族，同受治于共和政治之下，同享有平等之权利，满、蒙诸族其有抱负不凡者，起而为中华民国之总统可也。（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册，第25页）

尽管在革命酝酿阶段，在激烈的革命话语下，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中不乏种族言论，但是，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上，革命派终究摆脱了种族革命的羁绊，更多地赋予其政治革命的意义，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以中华民族为现代民族国家基石的民主共和国作为根本诉求。当革命党人真正完成了从革命角色向执政角色的转换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也就从自在转入自觉。武昌首义胜利后，革命志士提出“五族共和”，很快得到江浙地区独立诸省人士的响应。民国初年，曾经十分活跃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纷纷组建民族联合团体，化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如黄兴、刘揆一等人于1912年3月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陈其美在上海联合王人文等人电呈临时政府，要求成立融洽汉满禁书会，得到积极回应。即便是谋求帝制自为的袁世凯也曾授意其党羽设立“五大族共和联合会”、“五族国民合进会”之类的民族团体，积极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首先，将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建构与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一体化建设结合起来，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建设的民族基石。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一体两面：

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俾五洲列国益敦亲睦，于我视为唇齿兄弟之邦。（孙中山：《布告国民消除意见蠲除畛域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5页，中华书局1982年）

可见，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是主张合中国境内的各族群如一人，形成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汉族代表不了中华民族，其他少数民族也代表不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复合体。他稍后更提出“五族共和”实际上应是多民族共和：

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

呢？我的意见，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94页）

4

对外，中华民族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一员，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无高下贵贱之分，尊荣共享，患难与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936年国民政府宣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五五宪草）更是将“国族”概念列入根本大法，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43年》）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的民国宪法重申，“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中华民国宪法》，商务印书馆1947年）可见，五族共和、民族平等是国民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基于各民族平等、自由的民族一体化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民国初年的中小学教科书将民族平等意识的培养作为教材编写的重要原则，将五族共和视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如中华书局将“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主义，以巩固中华民国”列为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大意”之一，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小学教材同样“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南京国民政府从国家层面上将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向纵深推进。在1927-1937年的所谓“黄金十年”中，不仅广泛开展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而且还推行包括“新生活运动”、“乡村建设”、“国民教育”在内的现代国民形塑运动。

其次，将抗战救国、抗战建国与民族一体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共同的命运将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从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庐山谈话，到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号召，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摒除己见，携手合作，全面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明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个主要矛盾前面，国内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共同承担起保卫中华民族的重任，在八年抗战中，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全民族动员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取

得的胜利,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抗战时期,从学术上探讨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精神与气节的著作纷纷出版,如李方晨的《中华民族统一运动史》(启华书店 1939 年)、李广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41 年正义出版社)、张旭光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桂林文化供应社 1942 年)、李震同的《中华民族的来源》(上海民众书局 1942 年)等等,这些著作大多描述了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是如何融合成中华民族的。此外,更有许多有关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看,抗战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是一种建构、形塑中华民族为国族的集体历史记忆。在中小学教育中,抗战时期的小学及初中课本,继续以生动的语言、通俗的文学讲述着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故事,陶冶学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平等观念: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中华是我们四万五千万人的家,我们的祖宗生在这儿,死在这儿,我们自己现在也是生长在这儿。我们爱护我们四万五千万人的家,也爱护我们的民族。可是,我们的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呢?假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宗是怎样地从相打而相识,从相识而团结成功整个的中华民族,那末,我们将加倍热忱爱护我们的民族。(陈鹤琴、陈选善主编,马精武编辑:《中华民族的形成》导言,世界书局 1943 年)

将民族一体化建设与抗战救国、抗战建国有机结合起来典型例子莫过于大西北的再发现。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西北地区,历史上,曾因丝绸之路而一度辉煌,然而,近代以来渐渐落后了。抗战以来,随着东部大片国土的沦陷,国民政府西迁,大西北的重要性再次突显起来,"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在这一口号下,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开赴西南、西北,加强了对西部边疆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探讨,强调其中华民族发祥地和中华文化摇篮地的角色:

西北原来是我中华民族的摇篮地,我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过去既为了文化核心随着国际关系而转移到东南,致西北的文化停滞不前,这自然是我国文化发扬上的一种损失,但是今天的西北,应该为我国文化再高扬的出发地,因为在西北老家,还保存着诚朴的民性,勤俭的美德,还有精美的艺术,遗留的圣迹,这种种都是文化复兴的老根。(徐旭著:《西北建设论》第 6 页,中华书局 1944 年)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老家",西北各少数民族同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1938 年 3 月 2 日,顾颉刚考察了回民聚居的甘肃康乐县苏家集,从回民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认为"此等人有信仰,

无嗜好,身体强健,团结坚固,如克加以适当之教育,实足为复兴中华民族之中坚分子。”(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第20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无独有偶,作为国民政府西北工业考察团成员的李烛尘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赴西北进行了为期118天的参观考察,其间曾于12月25日夜,平生第一次观看了维族青年的话剧演出,看后他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之感”,颇有感慨地写道:

新省人民以维族为最多,有文字,有经典,及其他医药等书。且有音乐,其艺术之高明,即文化水准高尚之表现,而身体强健,知卫生,并无他种不良之习惯。是为中华民国民族中一优秀分子,奖掖扶植,即所以'永保新疆为中国领土'也。”(李烛尘:《西北历程》,第105页,文化印书社1945年)

对西北的再发现,大大促进了人们对西北的认同感,增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急迫感,其中固然有为抗战后方建设背书的政治因素,但是更为深层的,却是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个共同的文化因素。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一是在尊重多元文化、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原则下,加强了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民族化”,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从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增加到56个民族,各民族一律平等。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实行倾斜政策,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充分的表达权,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以来的西部大开发,在促进民族融合、缩小区域发展方面可视为近代以来西北建设的历史延伸。

辛亥革命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百年前的那场革命改变了中国的道路,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百年来,辛亥志士追求的国强与民富,始终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这一目标即将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以通俗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将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云呈现在读者面前,纪念之,缅怀之,诠释之,从历史中吸取蕴含的智慧,寄托对未来一百年的美好期盼。

目 录

第一章 风雨飘摇：革命前的中国	1
1、新社会阶层的产生	1
2、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15
3、不劳兵而有人国	20
4、洋人的朝廷	26
5、民众的苦难	30
第二章 何去何从：改良还是革命	41
1、从改良到革命	41
2、革命派的广泛宣传	50
3、革命团体的建立	58
4、清廷预备仿行立宪	67
5、立宪运动	70
第三章 遍地烽火：群众运动的高涨	75
1、官逼民反	75
2、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斗争	79
3、抢米风潮	85
4、反洋教斗争	89
5、秘密会社的反清活动	97
6、拒俄、拒法与抵制美货运动	102
7、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108
8、保路风潮	111
第四章 武昌首义：敢为天下先	119
1、东方芝加哥：清末武汉的经济与社会	119
2、革命准备：建立组织与运动新军	124

3、临战前的挫折·····	130
4、首义枪声与三镇光复·····	134
5、湖北军政府的成立·····	139
6、阳夏战争与停战议和·····	144
7、湖北各地的响应·····	156

第五章 各省响应：清朝统治的瓦解 ····· 161

1、湘赣起义·····	161
2、秦晋独立·····	165
3、云贵发难·····	170
4、江浙易帜·····	174
5、两广响应·····	181
6、皖闽川起事·····	186
7、滦州兵变·····	193
8、清政府的解体·····	199

8 第六章 创建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207

1、建都之争·····	207
2、南北和谈·····	214
3、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	223
4、巩固政权的政策措施·····	233
5、新政权的生存危机·····	244

第七章 得而复失：革命果实的丧失····· 253

1、列强的干涉·····	253
2、旧势力的渗透·····	262
3、革命派的分化·····	268
4、袁世凯逼宫·····	276
5、孙中山退位·····	285

第八章 讨袁护法：为共和再战 ····· 295

1、癸丑赣宁之役·····	295
---------------	-----

2、洪宪帝制	306
3、护国运动	314
4、张勋复辟	325
5、护法运动	334
第九章 百年遗产：辛亥革命后的经济社会变迁	343
1、从王朝体制到民主共和	343
2、工商业的初步发展	352
3、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	358
4、社会新风尚的兴起	369
5、记忆与诠释：百年来的辛亥革命纪念	378
参 考 文 献	389
后 记	391

第一章

风雨飘摇：革命前的中国

1、新社会阶层的产生

19 世纪初期，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经历了 100 多年的“康乾盛世”之后，逐渐失去了开国初期的勃勃生气，封建统治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经济上，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土地兼并，广大农民深受封建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陷于贫困破产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政治上，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皇帝专横独断，狂妄自大，朝廷官员愚昧闭塞，贪污成风。思想文化上，清朝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整个社会呈现出“万马齐喑”一片死寂的局面。军事上，武器落后，军备废弛，国防力量虚弱。正当清朝国势日暮西山的时候，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欧美列强为了开辟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开始大规模的海外侵略扩张，腐朽、专制、封闭的清王朝成为被掠夺的对象。1840 年，英国为了保护罪恶的鸦片走私贸易，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目的是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把中国变成它掠夺原料的基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之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不



□1842 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仅割占了中国大片土地，强行索要巨额赔款，而且获取在华通商传教、强占租界、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设立工厂、驻扎军队等特权。中国遭遇千古变局，不仅丧失了领土的完整，主权遭到破坏，而且在财政和外交方面开始依附外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将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所说，西方殖民者“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殖民主义具备“双重使命”，在消灭旧的亚细亚式的社会的同时，也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列宁也指出，“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在封建社会内部悄然产生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早在明朝后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等方面就已经出现了依稀可辨的资本主义萌芽，尤其是江南一带丝织业中已经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现象，孕育着资本主义的一些征兆。由于中国没有像西方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所形成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资本主义一直无法摆脱萌芽状态那种“蜗牛爬行的进度”。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洋布取代土布，洋铁排挤土铁，洋糖代替土糖，轮船驱逐帆船，中国传统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陷入了枯萎凋谢的境地。据统计，1864年中国进口的洋货价值约4600万两，1894年猛增至16000万多两，增长近三倍。然而，西方殖民主义在摧毁中国城镇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价廉物美的洋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商品，为了购买洋纱、洋布、洋火、洋糖、洋铁、洋油等这些日用品，中国农民逐渐改变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开始大量种植棉花、烟草、茶业等经济作物，不自觉的卷入到商品经济的体系中，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条件。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迫使广大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加之海运的兴起、铁路的修筑、电线的架设、新军的编练，更使原先依仗运河、官道、驿站为生的船户、脚夫、驿卒及绿营练勇纷纷失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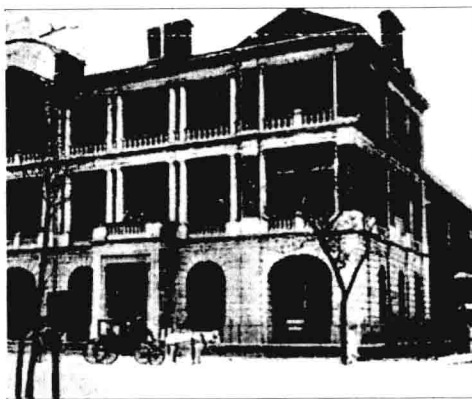
展提供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尽管近代中国尚未形成足够的资本原始积累，然而一部分同外国侵略者密切联系的买办、商人和一些利用封建权势搜刮聚敛的官僚、地主积累了相当财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广大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原始积累的贫困，这预示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是先天不良，后天不足。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大体以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为界限）是其兴起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体是1895年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其初步发展阶段。其主要载体是官督商办企业和商办企业，官督商办即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来经营管理，但在筹办时一般先由官方垫付部分官款作为资金，等商股募足后再陆续归还，官督商办企业一般享有减税、免税、贷款和专利等特权，其盈亏全归商人承担。商办企业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部分商人、官僚、买办和地主投资创办、自负盈亏的企业。此外，还存在少量官府出资经营的官办企业，官、商各出部分资金而由政府进行经营管理的官商合办企业。由于官督商办是多数，因而可

作为政府出资并掌握管理权这一类型的代表。在兴起阶段，官督商办企业占有显著优势，在初步发展阶段，商办企业后来居上，优势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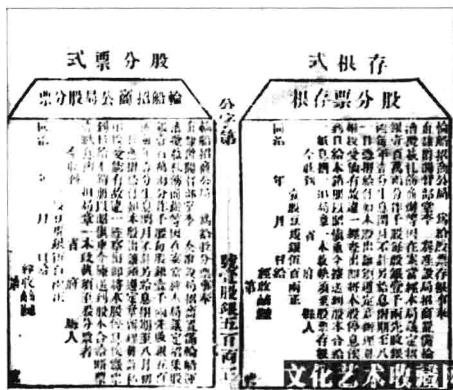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遭受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打击下，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自己武器的落后和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开明的洋务派进行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的自强新政运动。在60年代主要是购置西方枪械船炮、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由于完全依靠官款，给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进入70年代后，洋务派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资金、原料、燃料和运输困难，提出了“寓富于强”的口号，筹办了一批民用企业。依附洋行等外国资本的买办商人积累起了巨额财富，据有的学者估算，在1840-1894年间，买办商人通过进出口贸易佣金、推销鸦片佣金、外债经手回扣、银行买办盈利、军火买办收入等项目，积累了4亿海关两的巨额资本，而他们“诡寄洋行”即附股搭办在外国企业的资金也在四千万两白银以上。买办商人亦有依托清朝权贵来兴办企业以获取更大利润的愿望，他们和洋务派官员合伙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官督商办企业。

1872年，李鸿章命三品衔道员朱其昂筹设中国近代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后因募集商股情况不佳，委派具有筹办新式轮船航运经验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很快募集近百万两的商股。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和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局，其规模日渐扩大，1877年以220万两收购美商旗昌洋行，从最初的3只轮船发展到30只。到1884年，全部资产达到525万两，成为首屈一指的大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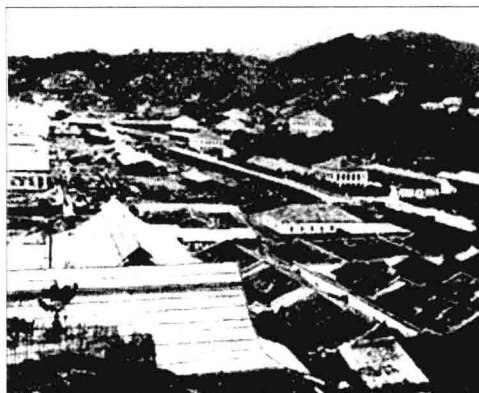


□ 轮船招商局

为了适应军事工业和轮船航运的需要并开辟利源，我国近代的工矿业是从机器采煤开始的，从1875年至1895年，我国兴办了16座大小新式煤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1875年沈葆楨奏请开办的台湾基隆煤矿和1876年李鸿章筹建的直隶开平煤矿。台湾的基隆煤矿是我国第一座近代煤矿，年产量达5400吨。1876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等筹建开平煤矿以解决招商局轮船和北洋海军用煤问题，所招股份大部分是唐廷枢和徐润二人“因友及友，辗转邀集”，订购国外机器，聘用英国技师，按照新法采煤，2年后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1881年日产量为五六百吨，1894年增至1500吨，有力的抵制



□ 轮船招商局发行的股票



□ 开平煤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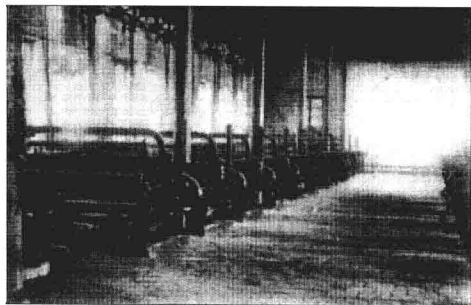
了洋煤进口。

为了满足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对金属原料的迫切需求，洋务运动期间我国成立了24家机器开采的金属矿业公司，其中铜矿8家，金矿6家，铅矿、银矿各4家，铁矿2家，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是1888年开始使用机器开采的漠河金矿，初期产量约值银12万两，1897年增至30多万两。钢铁冶炼也逐渐发展起来，1886年设立的贵州青溪铁厂是我国最早一个使用近代方法冶炼钢铁的工厂，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修建的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炼铁厂，1893年竣工后包括10个大小厂，聘用外国技师40人，工人约3000人。

中国近代铁路事业也开始发展，1881年开平矿务局修筑唐山至胥各庄一段专门运煤铁路——唐胥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又招股成立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将唐胥铁路扩展至天津和山海关外的中后所。刘铭传在台湾修建了基隆——台北新竹铁路。到1895年，全国修建铁路360多公里。

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的协助下，架设了大沽北塘口炮台至天津的电线，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条电报线，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并成立电报总局。截止至1894年洋务派共架设电报线44条，促进了我国通讯事业的发展。

1878年，李鸿章派英人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上海、烟台等地仿照西法试办邮政，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改驿站为邮政，建立台湾邮政总局，我国邮政逐渐向近代化发展。洋务派也创办了一些近代纺织业，1880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局是我国近代第一家纺织工业，也是官办的最早一家轻工企业。同期比较重要的轻工业还有1882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2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湖北织布局（张之洞还建立了纺纱、缫丝、制麻三局，和织布局并称“纺织



□兰州织呢局车间内部



□1888年唐胥铁路展筑至天津，李鸿章等巡视并主持通车仪式。